



做个儒雅中国人

王宝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讲 想孔子之为人	001
第一节 被抬上神坛的孔子	003
第二节 摔下神坛的孔子	013
第三节 孔子之为人	020
一、他们真的反孔子吗?	020
二、平凡的孔子	026
三、不平凡的孔子	034
第二讲 制度在礼——儒雅的社会秩序	038
第一节 礼之概说	039
一、礼之典籍	039
二、礼的特点	046
第二节 礼之用，和为贵	049
第三节 礼之用，民为本	058
第四节 礼之用，教为先	065
第五节 礼之用，法为辅	072
第六节 礼之用，选贤能	080
一、制度与人	080
二、儒家之选举	086
第七节 礼治天下——以明太祖为例	090

第三讲 仁者不忧——儒雅的心灵	101
第一节 仁者，人之德	102
一、解“仁”	102
二、说“德”	105
第二节 仁者，人之道	108
一、说“道”	109
二、中庸之道	111
第三节 仁与人性	117
一、孟荀论人性	117
二、性相近，习相远	120
第四节 修心以仁	124
第五节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33
第六节 为仁之方，知行合一	142
第四讲 文为在礼——儒雅的行为	147
第一节 礼仪之美	147
一、以冠礼为例	148
二、礼仪之美	156
第二节 礼义	161
一、礼义之大	162
二、礼义分解	165
第三节 日用行常，修身以礼	171
一、言语斯文	172
二、行为端正	179
三、行走坐卧，待人接物	191

第五讲 博学笃行 充实光大——儒雅的教育	199
第一节 尊德性而道问学	199
一、尊德性——人格之美	201
二、道问学及其与尊德性的关系	212
第二节 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	220
一、养不教，父之过	221
二、教不严，师之惰	229
第三节 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38
第六讲 以义为利——儒雅财富	251
第一节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252
第二节 富而可求，见利思义	262
一、贫而乐，富而好礼	263
二、富而可求	269
三、仁者以财发身	273

第一讲 想孔子之为人

近十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出现了所谓“国学复兴”的现象。我以为，它并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所推动，而是民间学人自发觉醒的结果，而且受众如此庞大，以至于网络、电视等媒体纷纷参与。管仲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文化的话语权自然要增强，何况民族的复兴，最终是文化的复兴。从小的方面来看，人们的物质生活丰足了，可是人们并不想那么庸俗地生活，于是想要改变自己的气质，使自己活得更文明、更有尊严。于是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粮，出现了历史热、国学热。其实，就是在传统中看到了两个字：“儒雅”！

可是说起“儒雅”二字，人们的感觉其实是模糊的，不知究竟何物可以称为“儒雅”，虽然心里都知道它是对人的褒美，也多少愿意去做个儒雅的人。我想，那就得先弄明白什么是儒雅。“儒”当然是指儒家，它的本义是指懂得儒术的人。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儒为“术士之称”。是哪个方面的术呢？实际上跟巫、医、卜、祝差不多，只是它专门从事诸如婚姻嫁娶、丧祭之礼的仪式。夏、商、周三代，人们最重视这些东西，它们不仅有一定的仪式，而且规则繁杂，不是普通人所能明了的。所以章太炎先生说：“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咳之矣。”（《国故论衡·原儒》）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类的方

术之人，懂得这些就是“多技”，也就是有文化、有才能，那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有“九能”，就是具有沟通天地、治国安邦等辅佐天子的本事。总之，要有一定的文化涵养和知识储备，才可以称得上是“儒”。其次，这些仪式，实际上是一整套繁杂的规矩——儒家称之为“礼”。这是每一个儒者必须遵守的，否则，也不能称之为“儒”。因此，儒者必须是进退有据且严格遵守礼的规范的人。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见到过哪个没有文化涵养的人是儒雅的，或者不守规矩、颐指气使的人是儒雅的呢？所谓“雅”，就是“正”，就是标准的意思。儒家“五经”之首的《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雅，是指周人的语言乃是雅言正音。《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在什么情况下说标准话或者官话呢？在读《诗经》《尚书》以及行礼的时候。那么所谓的雅，实际上就是无野语、不乱说。这个就是斯文。所以，雅，基本上是指我们说话要讲道理，不要乱说话，更不要说话没有高低深浅。假如一个人有文化，明事理，行为有规范，说话又斯文，那不就是儒雅吗？所以，要想做个儒雅之人，首先必须要有文化。好在如今教育普及，几乎每个人都有点文化，只是今天的文化与儒家所说的文化稍稍有点不同而已。再次要守礼。因为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了“礼”，也就是“失礼”了，没有标准了，所以说话做事几乎谈不上“雅”，相反，荒诞无稽的怪事怪话特别多。总之，知儒家之文化，守儒家之礼，才可以称得上“儒雅”。

儒雅儒雅，有儒才雅。所以要想自己变得“儒雅”，就得先了解儒家。要了解儒家，那就必须先了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现如今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孔子是个什么形象呢？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或者是成天板着一副神圣的面孔，正

襟危坐，动不动就要拿不合时宜的东西教训人。我想，多数人了解的是神坛上的圣人，而非真实生活中个性化的孔子。所以，有必要把他老人家从神坛请回到生活中来。

第一节 被抬上神坛的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从世界范围看，那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西方的希腊，有以苏格拉底学派为代表的诸多学派的思辨；东方的印度，有婆罗门、佛陀等等不同信仰的思考；而中国，则有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争鸣。那是人类第一次以理性的眼光看世界，他们都为人类的未来做了宏大的设想，所以都可以称得上是圣人。孔子生前，不敢称圣，歿后三百多年，除了儒门弟子，把他当作圣人的人也不多。西汉以后，孔子才真正由凡人圣。且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评价孔子是“至圣”，那就不仅是圣人，不是一般的“圣”，而是“圣”到极点了。他对孔子的评价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国“言六艺者”，都是在孔子传授的文化范围里学习和研究的，没有能够超出孔子的，那当然可以称之为“圣”了。所

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以来，尤其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言六艺者”也就是指知识分子。他们“折中于夫子”，就是进退皆以孔子为标准，无法超越孔子。对孔子的学术是“宗之”，即以孔子为源头。所以这个评价应该还是比较公允的。但是，孔子却不敢自称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他实在是很不情愿地被后世的人们抬上神坛的。

这些“人们”，首先是一批腐儒。为什么说他们是腐儒呢？因为他们多数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表述自己的一套哲学，背离甚至歪曲了孔子之道。其结果，使得儒学逐渐丧失了理性的光芒，最终走向死胡同。我们这里不是做儒家的学术史，所以，只从儒家演进的阶段性来讲。第一个这么干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写了一本《春秋繁露》。且看他怎样神化孔子的：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写作《春秋》这本书的哲学根基或者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天的意志。凡是孔子在《春秋》里讥讽或者反对的人和事，上天都会通过各种灾害或者怪异的自然现象来表示震怒和惩罚。《春秋》在记录各诸侯国君的罪过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不同寻常的自然灾害，目的是通过这些灾害反映人的罪过所在。

董仲舒觉得孔子认为天的意志对我们人类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天”就有了意志，而孔子似乎很了解天的意志。各位，你们谁知道老天爷的意志？可是董仲舒说孔子知道！于是，孔子变得不同常人，成了具有神格的人了，就是人格被神化了。

董仲舒在自己的《春秋繁露》里是这样说的：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春秋繁露·阴阳义》）

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这个就进一步阐发了他自己的哲学了。他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根本上是因为天也有这些情感。这就是所谓的天人相副或者天人感应。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跟上天规定的春夏秋冬一样，次序是不可改变的。君主主宰人民，就跟天主宰大地一样，也是不可改变的。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阴阳二气生成的道理，是圣人的根本大道，也是不可改变的。不仅如此，人世间，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不可违背天的意志。这就是“圣人之法”。而这个圣人，当然是指孔子了。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不讨论未知世界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公冶长》里这样记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先进》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不跟学生讲人性、天道、鬼神等抽象的或者虚无缥缈的

玩意儿。很显然，董仲舒篡改了孔子的学说，他所说的“孔子之术”，实际是董氏之术，是董仲舒自己的学说，而且他把孔子的人格神化了。人一旦被变成了神，那就只能走上神坛了。经过他的这种改变，孔子和儒家学术演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从以民为本体，变成以天或者帝王为本体。因此，他的学说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影响特别大。两汉大臣给皇帝的奏章，大多数都是打着孔子之名，称引“五经”，大谈“灾异之变”，用“天”的意志来规劝皇帝和制定政策。在《资治通鉴》里可以看到很多，如下所述：

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雉；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车骑将军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雉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经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宜谋于贤智，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资治通鉴》）

这是汉成帝鸿嘉二年（前19）三月，博士举行大射礼（帝王

在重要的祭祀前选拔人才的礼仪形式)时,有野鸡飞来,群集于庭院,经过台阶登上大堂鸣叫。而后,又飞集于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官府,接着,又飞集于未央宫承明殿的屋顶上。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认为这不正常,是上天的一个警告,上奏说:“天地之气,以类别互相呼应验证,向君王示警变异,虽然甚为微小,却很明显。野鸡听觉敏锐,能最先听到雷声,因而《月令》用野鸡的鸣叫来记录节气。《书经》记载:商朝的高宗武丁在祭祀开国之祖成汤时,曾出现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的不祥异象,于是高宗坚守正道,从而消弭了灾祸,这是转祸为福的明显验证。而今,野鸡在博士举行典礼之日,经过台阶登堂,在万人瞩目之下,引起连日的惊怪,一直飞过三公之府,飞过太常、宗正等主持宗庙祭典和皇族事务的官署,然后入宫。野鸡的停留对人们的警诫,是深刻而切要的,远远胜过人们之间的互相告诫。”可是成帝不愿意相信,他派中常侍晁闾问王音:“听说捕捉到的野鸡,很多羽毛都折断了,好像事先被人抓住关过,莫非有人故意制造变异?”王音反驳的同时,规劝汉成帝:“陛下怎能说这种亡国的话!不知谁敢主谋策划这种奸巧的计策,诬蔑扰乱圣德到如此地步!圣上左右善阿谀的大有人在,不必等我王音再逢迎也足够了。公卿及以下的各级官员,为保官位,人人自守,不敢说出一句正直的话。……陛下即位已十五年,没有继承皇位的嗣子,却天天驾车出游,干些有失德行的不道之举……老天屡次降下灾异,希望陛下能改正过失,可是皇上您就是不改。……为今之计,您应当像孔子所说那样,克制游玩不休的行为,以礼治国,求得上天保佑、太子降生,也许灾害变异才会消失。”

这种例子十分多,可见孔子在学术上被神化的程度。虽然有人说这个“天人感应”学说毕竟给皇权设计了一个限制——“天”

(周桂钿《十五堂哲学课》)，但是，神学色彩进一步，则理性光辉就退一步！

后世进一步神化孔子的是宋明的道学家们。代表人物当然是南宋的朱熹了。他是个大学问家，所以影响力极大。孔子的地位因了他在学术上达到神坛的顶点。明、清两代他自己也被神化了，每次祭孔他也陪着被祭祀。在他的著作《朱子语类》里，有这么一段：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问：“自孔子后，何故无圣人？”……浩杨录云：“自周后气薄，亦不生圣贤。”（《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是朱熹的学生记录整理的，形式一如《论语》，亦可见他不仅敬仰圣人，学圣人，简直就是自己要做圣人了。他认同“自孔子后”便没有圣人，就等于说，只有孔子是圣人。原因是从两周以来“气薄”，就是上天给予圣人出世的阴阳之气不够。虽然是吸收了程颐、程颢和张载的思想，可是渊源还依稀可见于董仲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更进一步了，说假如没有孔子，我们中国人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地过日子了，岂不可怕！那孔子何止是“圣人”，简直就是神了！长夜之语虽然不是朱熹第一个说的，可却是因为他而广为人知的。他是一代宗师，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范围虽是“四书”“五经”，可是只能以他的注解为标准。天下的士人，敢不读他的书么？他的书，其实是对两宋学术的大总结。两宋学术，照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说法：“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

者乃儒也。”（钱穆《朱子学提纲》）所谓文士之学，就是文章子集之学，如韩柳文章、欧阳修、三苏等，博通诸子百家。所谓讲师之学，如王安石《三经新义》等，专攻儒家经典，目的便是应对科举考试，其实当时叫作措大，“大言炎炎”，一脸正气，临事张皇，既穷且酸，等同今天教死书的教书匠。所谓“知道者”即精通道术的人，实际上就是道学、理学，其实并不怎么重视儒经原文，“乃借之自申己意，多无当于经文之本旨”（钱穆《朱子学提纲》）。专攻形而上的哲学，从天到地到人，无所不该，按照自己的理解，宣讲天、地，人的心、性、命、理。如朱熹的《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但是大多与儒家经典无关，都是打着圣人的名义，阐述自己个人的观点。朱熹在这三个方面之外，佛学、道学、史学，多所涉猎，是大多数人所不能企及的。其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可是他提倡的理学，已然掺杂了佛学和道学的成分。其讨论的“天理”“人欲”“理”“气”“性”“命”等等形而上的命题，正是孔子避免探讨的东西。所以，明清以来，措大们所讲的孔子，其实并不是真孔子，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他们所讲的儒家，已经远不是孔子的学说，而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着道学的主张。

其次，把孔子抬上神坛的，是政治的力量。鲁迅先生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些权势也主要是帝王之力。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他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当然了得。文治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帝王，这肯定不是个人的喜好问题，而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就是强化君主专制。《汉书·董仲舒传》记录的《举贤良对策》说得非常清楚：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就是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都曾经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可是秦始皇一把火便都偃旗息鼓了。汉初解秦之禁，于是重新活跃，各自阐释自己的学说，结果导致皇帝或者政府无所适从，不知道用哪一家的主张来治国才好，于是制度、法律不断地变化，老百姓也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董仲舒建议：凡是不符合孔子学说的诸子百家，一律禁止传播，一切以儒家学说为准。这样，制度、法律等社会规范就比较稳定清楚了，老百姓就知道该如何生产生活了，也会自觉地“忠君”，当然更不会造反了。

很显然，其意图就是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做顺民。这对于皇权和社会稳定来说，有着极大的好处。所以，汉武帝当然是欣然接受。普通人想要做官必须得通儒经才行。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因为治《春秋公羊学》才当上丞相的。所以学术变成了利禄之捷径。当学术与利禄紧密相连的时候，其理性价值就必然下滑，甚至丧失。不仅如此，在当时，儒家经典的地位甚至高过了法律。比如汉昭帝时，京兆尹隽不疑处理的一个案子：

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

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

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

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遂送诏狱。……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贵。坐诬罔不道，要斩。（《资治通鉴》）

以上说的是汉武帝听信谗言，废掉太子刘据——就是卫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武帝驾崩之后，昭帝即位。这时有个叫作成方遂的人，长得非常像刘据，于是冒充刘据跑到都城长安。满朝官员难辨真假，不知所措。然而，京兆尹隗不疑到现场，立即抓捕。他抓人的根据不是汉朝的法律，而是儒家的经典《春秋》。假如此人是真的废太子，那么，武帝已经下令处决，所以他没有死便违反君父之命；假如此人是假的，那么，欺瞒君父，更是大罪。总之，依据儒家“君为臣纲”之理的抓捕之举，不仅及时维稳，而且符合所谓的儒道。

于是乎，儒家的礼仪，开始从帝王到百姓，从法律到道德习俗，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也就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了。此后历朝历代，倡导所谓“以孝治国”，帝王的谥号，多冠以“孝”字，比如“孝武帝”“孝文帝”“孝成帝”等等。百姓的婚丧嫁娶甚至举手投足，无不遵循儒家的礼仪。这样，在人格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再加上政治上的抬高，孔子被抬上神坛的脚步，可不就得大步流星了吗？此后，历代帝王又不断地抬高这个神坛，比如大唐玄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以后各朝又加封其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甚至他的后裔也被封为“衍圣公”。南宋的庄绰在《鸡肋编》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当然，也有帝王比较信服儒家的治国理念，因而推崇孔子的，比如明太祖朱元

璋，他是个不错的皇帝，很是节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记载：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吴元年（1357）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左、右楼曰文楼、武楼。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每有闲暇，他就看看《论语》。他的皇宫墙壁上，不要金碧辉煌，只是要大学士写一些儒家经典的段落。对孔子的尊崇，也似乎是心悦诚服的。当然，朱元璋信服的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真孔子。但是儒家的地位、孔子的神坛可不就越来越高了吗？再比如人人熟悉的康熙大帝，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帝王，而且其他方面也十分了不起，弓马射猎、“四书五经”、佛教道教，甚至西洋人的几何机械，他几乎全都不错。可是他说：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日讲四书解义序》）

“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清圣祖实录》）

“士不学，则无以居官；学不正，则无以致用。夫六经、四书、濂洛关闽，学之正者也。历稽往代，莫不崇尚经术，兴数百年太平之基。”（《清圣祖实录》）

康熙那么博学，作为帝王，遗留给子孙的治国方略，不是刚刚兴起的科学，而是儒学。他当然不会欺骗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也是真的相信儒家学术。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也不得不说这是个历史的悲哀。他所说的学术正统，不是孔子，而是两宋道学的

经典代表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当然，这也为增高孔子的神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前文所述，神坛上坐着的也并不是真孔子。于是乎孔子被迫在神坛上待了两千年，中间虽然也有波折，但地位毫不动摇，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帝制倒掉之后，神坛的支架垮塌了，孔子也就被摔了下来，而且摔得可是不轻呢。

第二节 摔下神坛的孔子

西汉武帝以前，当孔子没有被抬上神坛的时候，除了儒门弟子之外，旁人并不把他当圣人看，他还免不了受嘲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郑国人讥讽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儿嘲笑他，然后拔腿便跑，孔子想跟他说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孔子去世以后，庄子接着嘲讽他和他的学说：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庄子·大宗师》）

道家是要人返璞归真的，要人做“真人”，就是充分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反对对人的道德约束。朋友死了，他们不悲哀，相反，他们觉得谁都免不了要死，所以死乃是一种“归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在死者面前又唱又笑。这与孔子学说相反。子贡看到他们在子桑户的遗体前编曲、鼓琴、唱歌，满脸愉悦、毫不